



中国文献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俄]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В.П.Васильев) 著

[中]赵春梅 译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1054 FIFTH AVENUE, NEW YORK, N. Y. 10028

BOOKS ARE LOANED TO INDIVIDUALS ONLY

FOR INFORMATION CONTACT

LIBRARY STAFF

中国文献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俄]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В.И.Васильев) 著

[中]赵春梅 译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献史/(俄)瓦西里耶夫著;赵春梅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47-7940-4

I. ①中… II. ①瓦… ②赵… III. ①文献学—研究
—中国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210 号

中国文献史

[俄]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著
[中]赵春梅 译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总序一^①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②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己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代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
- ① 这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所写的总序。
- ②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 1 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7~8 世纪;第三次在明朝,14~15 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 世纪;第五次在五四运动前后,20 世纪初到现在。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的、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总序二

张西平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出版已经十五年了,当年是任继愈先生写的总序,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他对“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关心和指导至今仍是我們考虑这套书的出发点。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大大深入了。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唯有如此,才能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同时也应看到,海外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完全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这就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而且在1814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由苏联传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中断了,而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者中国学),我们就搞不清我们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更为重要的在于今天中国崛起后,我们希望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如果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了解域外中国文化研究,不这样,我们自己的近代到当代的学术历史就搞不清,中国学术的当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话。

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建好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

学)。

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呢?以下三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不然会闹出笑话。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海外中国学书系”、“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列国汉学史”等多种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受到了欢迎。我们对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未在国际学术领域展开,中国研究,这个原本属于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基本格局尚未扭转。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的学术论争也可能是和西方的汉学家们之间展开的。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我们深思,有些则明显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所以,在与国外汉学家们打交道时,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世界的重心在向东方转移,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一切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看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更不应如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熟悉国际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学习汉学家们的宝贵经验,理解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的同时,纠正他们中一些汉学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与其展开学术的对话。这是更新我们的学术和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我们面临的双重任务。

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学术重建的必由之路。

国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存在,表明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海外中国学界的对话与合作,才能逐步拥有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发言权;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表达我们中国学术的理想、立场、传统与文化,才能在当下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真正重建中国当代学术体系和理论,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事业。

我们应该看到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展开的,从事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主体是汉学家,由此,我们在“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再版之际对丛书做了适当的调整,本书系分为三个方面:

一、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与研究系列。旨在介绍西方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同时展示国内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涉及中国和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它们构成了西方汉学的发生和中国明清思想文化裂变的基础。这是一批具有双边文化特点的著作,是研究全球化初期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的基础。

二、国际汉学经典译丛。旨在翻译和整理西方汉学历史名著,可以说,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目前国内西方汉学早期历史的重要著作基本是我们组织翻译的。我们将继续继承这个传统,将翻译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能涵盖西方各国汉学历史的名著。

三、汉学家传记翻译与研究系列。汉学家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系统地展开对重要汉学家研究,系统整理和翻译重要汉学家的传记,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更为生动、具象的画面。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期盼国内外年轻的学者们加入到“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写作和翻译中来,在这里书写汉学研究的新篇章,我期待着你们。

张西平

2013 年岁末于游心书屋

译者序

2010年1月,受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柳若梅老师的委托,我开始翻译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献史》^①。实际上,与瓦西里耶夫著作的相熟始于2001年,当时笔者正在莫斯科进行学术访问,为写作博士论文而收集相关资料。近三年的时光匆匆而逝,如今译作终于完成,掩卷长思,头脑中瓦西里耶夫的形象似乎比几年前更为清晰,可以说,我又向他走近了一步。

在笔者看来,人们眼中“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一代宗师”的身后隐藏着无数个瓦西里耶夫:虽出身贫寒,却聪明、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的少年;为了从喀山大学医学系转入公费的历史语文系,一次次向校长卑微地提出申请,自尊心严重受伤的大学生;身负多重使命远离祖国,跟随俄国东正教使团奔赴中国的热血青年;遭受东正教使团领队的欺压,温饱难以为继的异乡游子;白天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收集中国文献古籍,夜晚挑灯苦读的青年学者;回到俄国后潜心治学,却因手稿堆积如山无法出版而满腹辛酸的汉学家;为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汉学的开辟、俄罗斯汉学人才的培养与汉学传统的传承倾尽了毕生之力的老师……尽管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但是他身上却无时不闪耀着勤奋、坚韧与执着的光辉。

通读《中国文献史》一书,读者会发现,该书只是对各领域中国文献典籍的粗浅介绍,相对于中国文献的浩繁著述,区区十余万字的篇幅实在过小。而且书中瓦西里耶夫也明确表示,“这项工作无论如何都要交给下一代学者去完成了”,以及“必须对其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而这项研究本人无法胜任”。所以就像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献史》中曾经发问“孔子的功绩到底是什么”一样,面对俄罗斯汉学,乃至世界汉学界给予瓦西里耶夫的种种赞誉与肯定,我们也不仅想问:瓦西里耶夫的功绩到底是什么?而读罢《中国文献史》一书也许我们对此会有所感悟。

《中国文献史》于1880年在彼得堡出版,全书共163页。前以“几句开场白”为引言,后设简短结语,未列参考书目和索引,文中的脚注共82处,多是对所

^① 在博士论文中,笔者遵循了当时学术界的传统译法,该书被译为《中国文学史纲要》。

涉及的作者、作品,以及理解难度较大、容易产生歧义的词汇,或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等诸多方面的解释。全书未分章,而是以连续的15个小节构成,介绍了儒释道以及历史、地理、律法、语言学、农业、自然科学、医学、兵法、文学等方面的中国文献古籍。瓦西里耶夫在书中曾多次抱怨,如果不是受篇幅所限,《中国文献史》的内容会更加丰富,论述也会更为详细,因为他手中掌握着极其翔实的资料。事实确实如此,《中国文献史》的完成是以1888年石印出版的《中国文献史资料》为基础,该书共679页,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仅占292页,“附录”占去余下的387页。“附录”中列出了《中国文献史》一书中各领域的典籍文献,知名的,不知名的,应有尽有,典籍名称和作者都是以汉俄对照的形式出现,而且附有对每部作品的简短介绍。另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几句开场白”中瓦西里耶夫曾着重指出:“《中国文献史》的内容并非来自其他欧洲学者的著述,而是本人著作的浓缩,以及授课笔记。这些讲义资料绝大多数是中文书籍;本书所涉及的作品,我几乎都亲阅过。”实际上,这就是瓦西里耶夫提出的有别于当时大多数欧洲汉学家研究中国文献的方法——重视原文典籍,用他的话说:“我们最需要的是原文,尽一切可能阅读原文。”读到这里,笔者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在京期间瓦西里耶夫深夜苦读的身影:他手捧诗书蜷缩在寒冷的房间里,夜风袭来,除了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只有忽明忽暗的灯火陪伴着他;偶尔他也会回归到现实中,但一想到希望渺茫的未来,又不免更加愁肠百结。而这正是瓦西里耶夫在《北京日记》中呈现给我们的真实一幕,也是他一生的缩影——一位孜孜不倦苦读中文典籍的俄国汉学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瓦西里耶夫对俄罗斯汉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作为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汉学教授,他不但向学生介绍并展示了中国文献古籍,而且首次提出汉学研究要立足于中文典籍,甚至明确提出以下要求:“这一领域需要真正的学者,能够提出建设性观点的学者;更需要卓越的著作;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中国文化的众多领域尚待研究,需要我们为此付出努力,而且绝不能胡编乱造!”所以,在瓦西里耶夫的努力下,几十年后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俄苏汉学人才,如:中国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阿列克谢耶夫,擅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博士,著名满学家波兹涅耶夫,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的伊万诺夫斯基,在中国史籍翻译方面颇有建树的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以及专门针对中国国家制度、管理体制和孟子进行研究的波波夫,等等。也就是说,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献的介绍、资料收集和导向性研究为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专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中国文献史》一书中,我们既要看到瓦西里耶夫对中国古籍文献的肯定性评价,如,《诗经》《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与此同时也不应忽视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清政府面对列强的屡屡进犯所表现出的软弱无能,使得瓦西里耶夫的论述同样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如,他公然宣称,中国文献的丰富与更新应是在欧洲文化浪潮的影响下,在吸收欧洲思想、欧洲知识和欧洲精神后才能展开;同时他在论述中对宗教的轻慢,对中国历史典籍中融入大量传说内容的鄙夷,等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本书的翻译完成,首先应感谢柳若梅老师的信任,其次是在与特约编辑费青老师对书稿反复切磋的过程中笔者受益匪浅,书中的德文、法文书名的翻译还得到了来自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同事们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另外,《中国文献史》一书涵盖了众多领域的文献典籍,查找、核实工作着实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翻译工作难度很大,笔者才学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请指正。

赵春梅

2012年年末于南开园

瓦西里耶夫生平及学术成就综述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年)是 19 世纪俄罗斯汉学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从喀山大学的汉学到彼得堡大学的汉学,瓦西里耶夫对于汉学在高等教育中的发展壮大、俄罗斯汉学人才的培养与汉学传统的传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中国历史、民族、宗教、语言、文献史等方面的研究为 20 世纪俄罗斯汉学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堪称“19 世纪俄罗斯汉学的一代宗师”。

一、生平概述

瓦西里耶夫于 1818 年 4 月 22 日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位神职人员家庭。1834 年,他考入喀山大学医学系后因家境拮据而转入可公费学习的历史语文系,1837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838 年年末通过喀山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在喀山教育区督学穆辛—普希金的关照下,从 1835 年 1 月开始,瓦西里耶夫跟随喀山第一中学的伽尔桑·尼基图耶夫喇嘛学习蒙语。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导师科瓦列夫斯基^①对瓦西里耶夫学术兴趣和学术观点的形成影响很大,在他的指导下,瓦西里耶夫专注于佛教和东方思想的研究。1839 年,瓦西里耶夫获得了蒙古语文学硕士学位,不久,他又获得鞑靼语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前,1839 年 11 月 27 日科瓦列夫斯基推荐瓦西里耶夫成为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随团学生。他为瓦西里耶夫列出了学习任务:学习藏语、汉语、梵语,研究西藏、蒙古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尤其是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政治、历史和地理,了解亚洲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收集各类中国文献资料,甚至还包括很多与专业无关的内容,如为喀山大学博物馆收集种子,以及陆地植物、动物、鸟类、矿物等标本,关注中国工业、农业的发展情况,收集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情报,收集中国农用工

^① 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00—1878 年),俄国蒙古学奠基人,喀山大学教授。他知识渊博,在佛教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具和各种艺术品等。^①与此同时,俄国科学院还委托瓦西里耶夫搜集藏语和蒙古语书籍。临行前,瓦西里耶夫专门向喀山大学教授西维洛夫(Д. Сивиллов, 1788—1871年)学习汉语。1840年10月,瓦西里耶夫在经历了整整8个月的旅行后抵达北京。

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北京生活了近十年。入华之初,瓦西里耶夫曾满怀激情和抱负,他在1840年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头脑中满是计划,哪怕让我完成十分之一也好;上帝啊,真想品尝那成功的美酒。佛教文献中记载了信仰和排斥它的民族的历史,它的部分发展轨迹与其他宗教相类似,而本质上,在对文献和科学的影响、对国家政治状况的影响……对用以阐述自己理论的语言的影响方面,更是存在共性。佛教理论、藏语是我为自己列好的学习计划,这两门课程知识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如此:我的计划中还包括研究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献的中国文化,关注中亚一些富有争议的地区,学习满语、朝鲜语、突厥语……”^②但是,由于在学习上得不到使团领班波利卡尔普·图加利诺夫的支持,瓦西里耶夫在京期间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非常绝望。他在自传中对在北京时期的生活做了明确总结。他说:“那里,一切都由领班说了算,大家都不快乐,尤其是我。当然,我没被鞭打、体罚过,但更糟糕的是要承受排挤和侮辱。喀山大学为我在中国的学习提供资助。使团的上司亚洲司要求大司祭出示一份报告,也就是说,没有大司祭的首肯我一个戈比都不能动用……使团的其他成员都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都隶属于亚洲司,未经亚洲司和大司祭选拔而来到中国的只有我一个。显然,无论是亚洲司,还是大司祭,他们之所以给我提供学习条件,也只不过是到了在中国人面前装装样子罢了!”^③

不过,也是在这一时期,瓦西里耶夫克服种种阻碍,专心收集、整理和研究资料。如从1847年至1848年,他利用已去世的同伴戈尔斯基留下的佛教资料,编辑了两卷本的《佛教术语词典》。另外,他还积极学习汉语、藏语和满语,收集中国地图和各种文献资料,并建议使团向清政府请求赠予《丹珠尔》《甘珠尔》佛教

① Горбачёва З. И., Рус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г., стр. 238.

② Горбачёва З. И., Рус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г., стр. 238—239.

③ Горбачёва З. И., Рус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г., стр. 240.

经典。^① 在北京的生活对于瓦西里耶夫的一生意义重大。在北京,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完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的转向,即由喀山大学时期从事蒙古学、佛学研究,扩展到汉学研究,他搜集了大量中国史籍文献,为未来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1850年9月18日,瓦西里耶夫回到喀山,随后被派往喀山大学代替生病的汉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О. П.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1793—1850年)的工作。从12月5日起,瓦西里耶夫开始在历史语文系教授汉满语、中国历史等课程。1851年1月,瓦西里耶夫被任命为喀山大学汉满语教研室编外教授,后于1854年9月22日转为正式教授。

在喀山大学工作期间,瓦西里耶夫为汉满语教学工作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提供教材,开设课程,努力完善课程设置,以及组织作文竞赛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中国带回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的资料库。据史料记载,在由瓦西里耶夫为喀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汉语、满语、藏语书籍所作的编目中,有827种图书是他亲自从北京带回来的,占总数的绝大部分。科瓦列夫斯基和波波夫(А. В. Попов, 1808—1865年)在对这套书目进行鉴定后做了极高评价,他们说:“瓦西里耶夫先生不仅关心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且顾及到将要利用图书馆的几代人的研究活动。他带回的满文书籍,再加上图书馆原有的藏书,几乎涵盖了能够在中国找到的所有满文图书。藏文书籍中有一些稀世珍本,大部分的刊印地都不是北京。因此,如果政府决定在喀山大学开设藏语教研室的话,将来教师们将会在这所图书馆中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找到足够他们长期使用的珍贵资料。虽然瓦西里耶夫先生带回的蒙古语书籍相对较少,但是也足以丰富我们的图书馆。”^②为了使这套书目所涵盖的内容尽可能全面,瓦西里耶夫申请将俄国其他机构,特别是彼得堡科学院和外交部亚洲司所藏的汉语、满语、蒙古语书籍也编入目录。从1854年年初开始,瓦西里耶夫在彼得堡工作了一段时间,结识了同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进一步扩大了视野,为未来学术发展铺平了道路。

1854年10月22日,国民教育部下令将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部改建为东方系,以及决定在喀山大学、喀山第一中学终止东方语教学。1855年4月20日,国

① Горбачёва З. И., Петров Н. А. Рус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г., стр. 240.

②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Васильева В. П.,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М. 1974г. стр. 60—61.

民教育部将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并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1855年,瓦西里耶夫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主任;1878—1893年,他担任东方系主任。直到19世纪90年代之前,东方系的所有活动,尤其是汉满语方面的活动,都与瓦西里耶夫密切相关。甚至在瓦西里耶夫1893年退休后直至去世前的3个月,他仍然为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全年开设“论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学”的课程。从1855年直到1900年病逝,瓦西里耶夫在彼得堡工作了近半个世纪,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855年,在东方系开课前,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满语专业只有3名学生。在主要以瓦西里耶夫为首的所有教职员工的努力下,到1859年增至5名,1860年为8名,而1867年全专业已经有15名学生,学生人数呈逐年增长的趋势。瓦西里耶夫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东方系毕业的学生不仅可以胜任翻译工作,而且能够在外交和行政部门任职”。^①此外,他还强调,东方系的教师必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固定的研究方向,才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收获。^②

瓦西里耶夫为俄国培养出多位汉学名家,如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年),以研究汉语和中国古代史而闻名于世;波兹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 1851—1920年),是著名满学家,担任弗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首任院长,1903—1907年担任俄国国民教育部部务委员;伊万诺夫斯基(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 1863—1903年),是著名满学家,以中国历史和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在中国史籍翻译方面颇有建树;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年),担任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等。

这一时期,瓦西里耶夫改进、完善并推动了彼得堡大学中国历史教学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彼得堡大学的中国历史教学状况还很落后,东方系师资力量极度匮乏,教材严重缺乏,尚未使用中国史籍,专业化水平也较低。针对上述落后状况,瓦西里耶夫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撰、人才培养、历史学科的专业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第一,他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了中国历史课的授课内容。“19世纪中叶中国的行政区划”,“公元前12世纪之前的中国古代史”,以及“从东周、西周至清代中国历朝史”和“中国史籍”等课程相继设立。这些历史课程在内容上涉及了鲜

① Горбачёва З. И., Рус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г., стр. 310.

② Горбачёва З. И., Рус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г., стр. 312.

卑、契丹、女真、蒙古等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此外,在时间上瓦西里耶夫严格按照朝代出现的先后排序,这一点不但在“从东周、西周至清代中国历朝史”课程上有所体现,而且在他亲自制定的“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文献教学大纲”中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一个专题的题目就是“时期的划分——总论中国历朝兴衰之原因”。^①除了为汉、满语专业学生授课,瓦西里耶夫还直接参与了东方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工作。早在该教研室成立之初的1863年,瓦西里耶夫在关心课程设置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中国历史、考古、地理方面的教学实践。作为汉满语教研室的教授,他同时为东方历史教研室开设东亚国家历史、地理、律法课程,他甚至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中俄关系史资料,将中俄关系的内容引入了课堂,从而使东方历史教研室课程设置更加完备,也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第二,瓦西里耶夫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学材料。他制定了专门的中国历史课程教学大纲,该大纲一直沿用了几十年。^②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瓦西里耶夫开始致力于包括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考古、地理方面的教材出版工作,“当时,瓦西里耶夫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为学生提供必备的教材上”^③。1866年,《汉语文选·第一册:注释》(Примечания к первому выпуску китайской хрестоматии)问世,后来又接连出版了《中国地理概述》(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географии Китая)、《中国古代地理区划》(Древне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Китая)、《西藏地理》(География Тибета)等教材。《元、明两朝关于满洲人的资料》也是他在1855—1858年教学笔记的基础上著作完成的。当时东方系的教材出版十分困难,如为了出版《满语文选》,1859年瓦西里耶夫就向学校递交了数额为350卢布的经费申请;1860年,他甚至提出以消减自己的工资为交换条件以获得批准;1861年,他再次提出申请,最后直到1863年该书才得以出版。^④

第三,瓦西里耶夫还利用各种途径激发学生对中国的历史和史料的兴趣,并将其看作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必要条件。1889年,在瓦西里耶夫的鼓

① Смолин Г. Я.,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истор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Наука, 1974г., стр. 72.

② Смолин Г. Я.,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истор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Наука, 1974г., стр. 72.

③ Григорьев В.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течение первых пятидесяти лет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ка, СПб., 1870 г., стр. 417—418.

④ Горбачёва З. И., Рус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г., стр. 315.